

导论

工业革命和欧洲文明崛起的背景下诞生了西方经济学，数字革命和中华文明复兴的背景下催生了数字时代新人文经济学。数字时代新人文经济学是个全新的研究领域。它既不是文化产业领域的文化经济学，也不同于人本主义哲学基础上的西方人文（本）主义经济学。它不是经济学与文化学的简单“物理组装”，而是经济研究与文化研究的深刻“化学反应”，是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有机统一的新领域、新学科、新理论，是建立在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实践基础上、具有浓郁东方文化特色和独特分析架构、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始终贯穿人文价值取向、研究人的全面发展与文明进步的完整学科理论。其理论前提、理论内核、理论意义、理论背景、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视角、研究目标值得深入探讨。

一、新实践：数字时代新人文经济学的背景与意义

理论来自实践，回答实践问题，引领实践发展。经济学理论也是人类在不断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凝结成的具有时代性的思想学说。西方经济学是西方文明崛起的时代产物。数字时代新人文经济学则随着中华文明复兴应运而生。数字时代新人文经济学是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中，通过不断探索总结中国经济发展规律、借鉴人类社会优秀文明成果、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汲取西方经济学理论营养并将之本土化、具有新时代中国特色的创新性经济学理论。

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实现了价值观由神向人的转变，激发出人的能动性，造就了近代西方文明崛起，在此背景下产生了以“经济人”假设为前提的西方经济学。西方经济学以研究逐利为开端，不断发展完善理论体系。15世纪欧洲“地理大发现”，刺激了欧洲对外贸易扩张和工场手工业发展，旨在追求货币财富的重商主义思想开始传播。随着产业资本的壮大，对财富生产和分配规律的探讨不

断深入，研究重点由流通环节进入生产环节，由此诞生了古典经济学，标志着西方经济学正式确立。18世纪西方经济学形成了完整的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19世纪边际革命形成了微观经济学理论，20世纪凯恩斯革命形成了宏观经济学理论。西方经济学在西方文明的兴盛和扩散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对世界经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也是西方文明为人类文明做出的思想贡献和理论成果。

不过，同众多学科一样，经济学研究受到历史条件和文化条件的制约。特定的历史文化条件形成特定的社会关系和生态关系，并创造出相应的、历史的、暂时的范畴、理论和观念，来描述这些现象和规律。随着时代不断发展，新生事物突破原有理论框架。虽然古希腊先贤就曾经提出过经济学目标是人而非财富的观点，一些近代经济学家也提出过经济学研究中人与财富并重的思想，但西方经济学的研究重点后来还是全面倒向财富一边。这导致西方现代化虽在世界上出现最早，却始终存在财富至上、利益优先的社会弊端，贫富差距拉大、两极分化严重，经济以资本为中心，目标追求资本利益最大化，而不是绝大多数人的利益。“今天，西方国家日渐陷入困境，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无法遏制资本贪婪的本性，无法解决物质主义膨胀、精神贫乏等痼疾。”^①在理论发展的深刻困境面前，经济学的目标需要由“物”向“人”、由“财富”向“精神”转变，数字时代新人文经济学的勃兴是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时代要求。

数字时代新人文经济学的萌发是中华文明复兴的时代产物。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实现了超过四十年的高速增长，让14亿人摆脱贫困。当前中国有全球最完整的工业体系和产业链，经济规模世界排名坐二望一，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比重接近20%，全社会研发经费居世界第二位，研发人员总量居世界首位，创新力量不断增强，世界经济版图正在发生几百年来未有的重大变化，中国人民正在前所未有地接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目标。解释这种变化、指导未来发展的创新理论也呼之欲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类历史上非常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鲜明特色。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全球经济发展大格局和中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中，通过探索和提出现实问题的解决办法，并不断总结和提升规律性认识，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逐渐形成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一整套思想理念、制度安排、政策举措。中国实现现代化的路径与西方国家发展路径明显不同，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

^① 习近平. 中国式现代化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康庄大道 [J]. 求是, 2023(16).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本质特征是区别于西方式现代化的显著标志，中华文明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与西方文明存在诸多差异，由此具备孵化出新的经济学理论的实践基础与理论条件。

中国式现代化是赓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是文明更新的结果，不是其他国家现代化的翻版。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学习和参考了西方经济学理论，但没有也无法照抄照搬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模式，而是凸显中华文明特点，并将中华文明的精神及智慧与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相结合，聚变为数字时代新人文经济学新理论。中国人传统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既反映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和人文底蕴，又影响着现代中国人的行为方式与思维方法，从而在中国经济运行过程中呈现出有别于西方经济发展的模式与路径。中国式人文经济学也不同于西方经济学的重经济轻文化缺少人文关怀，而是将价值要素纳入经济学体系，对物质和精神领域均衡发展的自觉调整尤为明显。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不追求利益最大化，也不提倡唯利益论，而是更加强调道义的重要性，并且推崇集体主义思想，反对个人主义倾向，重视社会绝大多数人的利益优先。执两用中、守中致和的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影响人文经济学的思维方式，经世致用、义利并举的中国传统价值观孕育数字时代新人文经济学的理论核心，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中国传统治国理念形塑人文经济学的发展方向。在这些文化观念熏陶中萌生、发展、成长的数字时代新人文经济学是中国土壤孕育出来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基因的经济学，其对人文和经济关系的探索跨越了几千年的历史长河，充满了中国风格与中国智慧。

数字时代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生的显著变化也要求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要有时代性创新发展。数字革命后，生产力的发展轨迹呈现出从工业革命时代“替代体力”到数字时代前期“模拟脑力”再到“人机协作”趋势的演进路径。算法、算力、数据的迅猛发展大幅提升了生产力的可能性边界。算法通过对海量历史数据的学习，提炼出模式与规律，形成预测模型或决策规则，在强大算力的支撑下，在信息处理、模式识别、趋势预测、风险评估等认知密集型任务上模拟和替代人脑，解放了人类在重复性、规则性、大数据处理方面的脑力负担，极大地提升了信息处理的速度和规模。机器在越来越多的特定任务上超越人类个体，人工智能与人机协作开始释放前所未有的创造潜能。生产力发展的根本目标是不是永无止境地追求更高效率、更快速度、更大产出成为数字时代的重要思考。人类需要新的经济理论指导生产力发展的目标升维，从“效率至上”的单一

维度，跃升至“人的全面发展”与“心智解放”的更高维度。生产力的终极目标不再是外化的效率与增长，而是回归到人本身，能够最大化每个人的自由发展空间，释放其内在的创造潜能，使其能够追求真知、体验美好、创造价值、实现更深层次的生命意义。数字智能技术应成为实现“人的解放”目标的加速器。这不仅不仅是生产力跃迁的时代要求，更是人类存在方式进化拐点的深刻要求。

数字时代生产关系的重塑也对经济学理论创新提出新的要求。首先是互联网平台的崛起，对工业时代形成的经典劳资二元结构产生了强大的溶解与重构效应。平台经济创造了一种新型的生产组织方式，其特征集中体现为产消者融合和节点化协作，由此改变了价值创造、劳动组织与权力分配的格局。平台重构了市场权力关系。平台企业凭借其控制的连接枢纽、用户数据、算法规则和网络效应，获得了巨大的市场权力和议价能力。平台也松动了传统资本与劳工的关系。它们通常不直接雇佣大量产消者，规避了传统雇佣关系下的责任，却通过规则制定和数据控制深刻影响着这些参与者的生计和机会。此外，分散化、灵活化、个体化的工作形态，以及平台算法的黑箱特性，使得产消者之间利益诉求差异大，难以形成有效的集体力量与平台博弈。平台经济的生产关系重构，释放了个体创造力和灵活性，也打破了僵化的二元阶级结构。

其次，数据要素的共享基因，对私有产权独占逻辑构成了根本性挑战，进而动摇了工业时代形成的生产关系基石。一是冲击资源稀缺性假设。西方经济学中，生产关系建立在资源稀缺、必须通过排他性占有才能有效配置的假设上。数据要素的非排他性和近乎无限供给，质疑了这种独占的必要性和效率。二是挑战价值源泉理论。传统工业范式下，价值主要源于劳动作用于独占的生产资料。在数字经济中，价值越来越多地源于网络连接、数据聚合、协同创造。个体数据的价值有限，海量数据的聚合分析才产生巨大价值。这凸显了集体协作的重要性，而非单一主体的独占。三是削弱排他性控制的根基。试图对数据施加严格的排他性控制不仅成本高昂，而且可能阻碍其潜在价值的实现，最终损害整体效率与创新。数据天然具有“要求流动与共享”的属性。数据的特性催生了多种基于共享逻辑的新生产组织模式：①开源运动。开发者社区基于共享、协作、互惠的原则共同创造和维护这些公共数字资产，挑战了私有化的商业模式。②开放数据。政府、科研机构、企业将非敏感数据向社会免费开放，促进透明治理、科学研究、商业创新和公众参与。③知识共享。提供灵活的版权许可协议，允许创作者在保留部分权利的同时，主动授权他人共享、传播，甚至基于其作品进行再创作，促

进了知识的广泛传播与再利用。四是数据协作池。个体或组织将各自的数据在特定规则下汇聚成共享池，用于共同受益的研究或服务。

最后，作为新型生产关系的基于数字公域和网络化协作的共同体模式正在全球范围内悄然萌芽。数字公域是由社区共同创造、共同治理、共同维护，并遵循特定规则向所有成员甚至全社会开放使用的数字资源集合。它是数据共享基因在制度层面的落实形式。这代表着对传统私有独占和平台垄断的超越，旨在利用技术手段构建更开放、民主、公平、由参与者共同治理和受益的生产关系雏形，可视为一种数字公有制的早期实践。基于数字公域的理念，涌现出多种探索新型生产关系的共同体形态。一是平台合作社。由用户（劳动者、消费者、生产者）共同拥有和民主治理的数字平台。二是去中心化自治组织。基于区块链和智能合约运行的、无传统中心化管理层的组织形态。三是开放科学与知识共同体。开放获取学术出版、开放预印本平台、开放协作研究项目、基于区块链的科研资助与成果共享。四是数据信托与合作社。这是由独立受托人或成员共同管理的法律实体，代表个人或群体管理和授权使用其数据。这些探索共同指向一种数字公有制的雏形。它具有以下特征：一是生产资料（数据、平台、知识）的共同体所有或开放共享。核心资源不属于私人独占，而是由使用和创造它们的共同体共同拥有或遵循开放原则。二是治理的去中心化与民主参与。决策权尽可能分散，成员基于贡献或身份拥有参与治理的权利。三是价值创造的网络化协作。价值源于成员间的互联、协作、共享与集体智慧。四是价值分配的公平导向。分配机制设计更注重贡献回报、普惠共享和共同体可持续发展，而非资本回报最大化。五是目标的多维性。追求经济效率的同时，也注重社会公平、个体赋权、民主治理、生态可持续等多元价值。

从工业时代资本与劳动的二元对立，到数字时代平台经济的权力重构，再到共享基因的显现与数字公有制雏形的探索，生产关系的演进轨迹是从矛盾化的阶级结构走向网络化的共同体形态。信息技术，特别是数据的非排他性特质和网络连接能力，为这种转型提供了物质基础。平台合作社、DAO、开放协作项目等新型共同体的实践，虽然仍处于早期且充满挑战，却代表着一种极具潜力的生产关系创新。它们试图将所有权、治理权、数据主权和价值分配权更多地赋予实际参与价值创造的共同体成员，而非远离生产过程的资本所有者或垄断性平台。其目标不仅是效率，更是公平、民主、可持续和人的主体性回归。这种转型绝非一蹴而就。它需要持续的技术迭代、深刻的制度创新、广泛的社会共识构建以及对

多元价值的追求。构建基于共享、协作、共同治理的网络化共同体，已成为利用数字技术潜能、创造更具包容性和可持续性的未来生产关系的关键探索方向。这不仅是经济结构的变革，更是迈向一个更平等、更自由、更尊重个体价值的数字文明社会的深刻尝试。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剧烈变动的时代背景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需要有时代性创新发展。

数字时代新人文经济学对解释和阐明人类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具有丰富深刻的理论意义。

一是构建中国特色中国自主的人文经济话语体系。中国式现代化是人类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最新现象，有着独特规律。数字时代新人文经济学具有立足中国实践、坚持问题导向、反映时代进步的特点。它把以人民为中心、扎实推进人民物质富裕和精神富裕、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作为人文经济学的出发点、落脚点和主题主线，贯穿整个理论体系。它把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与中国人文学科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结合起来，实现人文学科与经济学科的融合发展。它把人文与经济交融共生作为理论发展创新中的侧重点，突破西方经济学的概念、理论、思维等局限，运用具有中国本土特点的新思想、新理念、新方法，提出新范式、新范畴、新表述，打造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人文经济学话语体系。这个体系通过将理性的经济活动与感性的人文因素相结合，有效构筑系统完整、逻辑一致的理论学科和实践体系，其中蕴含着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价值与鲜明的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实践特色，是用中国道理总结中国经验，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有助于突破西方经济学的局限，完成从总结人类经济发展的特殊规律到探索一般规律的知识扩展。

二是推动经济学理论“人文回归”与“文化自觉”。数字时代新人文经济学不是对西方经济学的补充，而是基于中国传统文化和当代实践衍生出的科学完整的经济学理论体系。数字时代新人文经济学从“人”的视角回答经济发展为了谁、依靠谁、成果由谁共享的重要命题，彰显了经济发展的人文价值取向。相较于西方经济学主张通过可能会牺牲人文关怀的市场震荡最终实现资源配置的自发平衡，数字时代新人文经济学则主张通过主动把握物质与精神的不同领域政策与制度调节，协调好人与人之间、个体与集体之间的和谐关系，自觉实现经济发展与文明进步的平衡。从自发平衡到自觉平衡，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文化是人类发展的伴生现象。文化因素由经济发展的外生因素转化为内生因素，对经济学转型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三是调整人与国家由“片面发展”向“全面发展”。数字时代新人文经济学的核心是研究人与国家如何实现基于价值均衡的全面发展。个体追求美好生活，集体追求国家富强，这些目标的最佳状态是均衡，而非最大化。在传统的西方经济学中，资本逐利本性的逻辑推导，必然是追求财富最大化。这是一种片面发展的目标。个人与国家的财富增加虽然有助于文明水平提升，却不能与之画等号。数字时代新人文经济学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国家正义而繁荣的进步、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同步提升，这是与西方经济学不同的价值观和研究方向。全面发展是坚持以人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将无法合理量化价值的人文因素纳入经济发展的决策当中。西方经济学中无法量化价值的因素往往会在行为决策中被舍弃，数字时代新人文经济学以人文感性和经济理性的交织融合破除了西方经济学范式下绝对理性带来的发展困境和价值缺失，是对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理论超越。

四是转变前提和理念从“个人主义”到“集体主义”。欧洲文艺复兴让西方文明开启由神到人的转变，在此背景下产生的西方经济学充满个人主义色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此背景下成长的数字时代新人文经济学突出集体主义特征。集体主义崇尚共同利益与利益协调，反对个人利益优先于集体利益。同时集体应不断调整政策措施保障和发展个人利益，并引导人们自觉做到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必要时甚至牺牲个人利益保护集体利益。以分工和多元利益主体为前提的市场经济本身蕴含着对集体主义的需求。集体主义是数字时代新人文经济学的研究出发点，也是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理念。数字时代新人文经济学具有集体主义哲学思想，是人民至上原则、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以和合精神包容天下，推动共同富裕和提升社会治理等中国式现代化特色和本质要求的具体体现。这种鲜明特征改变了经济学理论研究的思维方式与前提假设，是真正意义上的理论飞跃。

数字时代新人文经济学对规范和引导中国式现代化未来发展具有重要深远的实践意义。

一是经济层面。数字时代新人文经济学对中国经济发展经验的归纳、分析和抽象，不仅涉及经济学的理论范式之变，更是中国经济未来发展方向和路径的重要参考依据。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是一个在继承中发展、在守正中创新的历史过程。运用人文经济学进行政策设计，是在洞察世界发展趋势、准确把握人民群众共同愿望、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自觉探索经济社会发展规律，使制

定的规划和政策体系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稳步前进。当前，全球产业体系和产业链供应链呈现多元化布局、区域化合作、绿色化转型、数字化加速的态势，新能源、人工智能、生物制造、绿色低碳、量子计算等前沿技术研发和应用正在加速推广，数字时代新人文经济学可以利用其涵盖内容广泛的优势，提供特有的研究视角与方法，设计更加符合国情的政策路线，顺应经济发展规律和历史大趋势，处理好效率与公平、活力与秩序、自主与开放的关系，探索如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发挥资本的积极作用，同时有效控制资本的消极作用，从而增强国民经济的生存力、竞争力、发展力、持续力，确保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不迟滞甚至中断，胜利实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

二是文化层面。人文是人类社会的各种文化现象。文化关乎国本、国运。数字时代新人文经济学对文化的重视加强了精神领域的独立自主，使文化自信的自觉性达到了新高度。数字时代新人文经济学的实践来自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熏陶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马克思主义从社会关系的角度把握人的本质，中华文化把人置于家国天下之中，都反对把人看作孤立的个体。数字时代新人文经济学的突出特征是强调集体主义，反对个人主义，在现代化道路中厚植人文底色，研究在特定文化环境中推动人的全面发展。传统上，中华文化具有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精神特质和发展形态，奠定了中国道路的深厚文化底蕴。现实中，中国已经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正不断把高质量发展成果转化为人民高品质生活，推动共同富裕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数字时代新人文经济学可以让经济发展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制度创新和政策创新，进一步增强国民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提升，推动并不断丰富中华文化的创新发展。

三是管理层面。与传统的西方经济学的政策主张不同，中国式人文经济学不仅重视为政以法，还强调为政以德，不仅要完善有效市场，更要建设有为政府。西方经济学往往是在既定的制度条件下研究机制运行与政策制定，通过法治手段确保参与主体不违反制度规则。人文经济学要研究如何处理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关系，并强调市场主体的道德约束的重要性。在实践应用中，一方面，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通过建设法治体系全面推进各方面工作法治化。另一方面，强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德治工作，提升市场主体的人文素质和道德观

念，形成对经济行为合理性的自我约束。资本是逐利的，但资本持有者是可以有道德的。数字时代新人文经济学有助于打造政府新角色，促进在依法加强对资本的有效监管、遏制资本无序扩张的同时，培育让资本有序发展、向好向上的良好环境，打造市场机制与政府力量双重保障的管理体系。

四是生态层面。解决生态环境问题需要有正确的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数字时代新人文经济学研究如何加快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如何通过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如何统筹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以促进生态环境持续改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近代以来，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大都经历了对自然资源肆意掠夺和对生态环境恶性破坏的阶段，在创造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往往造成环境污染、资源枯竭等严重问题。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特点是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优秀理念，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生态要求。数字时代新人文经济学在天人合一理念下高度重视生态环境建设，研究如何推进物质文明和生态文明相协调的生态和谐的现代化，有助于总结和推广已有经验，设计和增加创新手段。

二、新范式：数字时代新人文经济学的逻辑与方法

数字时代新人文经济学在理论前提、理论内核、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等方面具有不同于传统西方经济学的内涵，是经济学领域的重要范式转型和理论创新。

首先，人文经济学的理论前提是“集体人”假设，而非“经济人”假设。在分析人的行为之前，假设每个人都是生活在集体中，受集体文化和集体利益的影响。集体产生文化，文化影响观念，观念决定行为。文化在西方经济学理论中是外生变量。西方文化是形成西方经济学中“经济人”假设的文化背景，也是西方经济学各派理论的隐含前提。然而客观现实中，西方文化只是众多人类文化中的一种形态，由此产生的理论不应被视为无地域限制的基本原理和普世真理。马克思主义传统和中华文化都反对把人看作孤立的个体，而应置于社会文化中分析。《共产党宣言》指出利己价值观的狭隘性：“你们的利己观念使你们把自己的生产关系和所有制关系从历史的、在生产过程中是暂时的关系变成永恒的自然规律和理性规律，这种利己观念是你们和一切灭亡了的统治阶级所共有的。”^①事实上，

^① 中共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著作选编[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34.

在某些文化观念里，即使成本很低、收益很大的交易也可能会被拒绝，这种客观现象不符合西方经济学理论的“经济人”假设，却符合“集体人”假设。因为在数字时代新人文经济学中，文化观念或制度规范是内生变量，文化观念或制度规范可以限制某些交易的发生。例如中国文化讲求“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追求财富需要以“道义”为前提，只有符合这种文化价值的经济活动才是能接受的和可持续的。集体文化是“集体人”假设的重要背景与特征。

西方经济学基于“经济人”基本假设构建起的分析人的经济行为的理论范式，主要研究目标是实现经济行为的利益最大化，包括消费者的效用最大化、生产者的利润最大化、国家或地区的福利最大化，并通过这种理论分析框架解释各种社会经济现象。虽然已经发展为成熟的学科理论，但如果进一步放宽前提假设，将“经济人”假设换作“集体人”假设，则新理论能够更好解释诸多现象，如：羊群效应，不谋私利、舍己为人、舍生取义的利他行为，不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企业家，财富水平低但幸福指数高的居民等。纯粹的“经济人”在现实中并不存在，“经济人”假设只是基于特定研究目标和研究角度对人的一种抽象，前提假设的片面性决定了由此推导的理论体系的局限性。“经济人”假定人的行为基于理性和自利，但现实中人的行为常常是基于惯性、感性、理想等因素。西方哲学中也有用意志否定理性的“唯意志论”。人在自身利益之外，还有尊严、情感、信仰等其他目标，影响人的选择，导致利他行为。

西方经济学“经济人”假设类似于力学中的无摩擦状态或经济学中的完全竞争状态，而数字时代新人文经济学的“集体人”假设则类似于摩擦状态或垄断竞争状态，这更符合人类社会真实情况，也是对前提条件的放宽。理论的创新发展往往是从放宽前提条件开始。数字时代新人文经济学的理论前提较之西方经济学进一步接近现实，对解释现实有更广阔的理论空间。利己是个体生存的本能，利他是集体生存的需要，二者均为社会现实。绝大多数情况下，个人都生活在集体中，个人行为无法摆脱集体的影响，也必须考虑集体的反应。在信息不完整的现实情况下，“集体人”也比“经济人”的“理性”或“有限理性”程度更高。前提假设放宽后，“集体人”假设可以消除“经济人”假设中的一些理论痼疾和逻辑困扰。例如，西方经济学中存在“合成推理谬误”，即“由于某一原因而对个体说来是对的，便据此而认为对整体说来也是对的”。^①对“集体人”而言，只有同时符合个人与集体利益的选择才是“对”的，因此当个人选择合成推广到集体

^① [美] 保罗·A. 萨缪尔森，威廉·D. 诺德豪斯. 经济学[M]. 高鸿业，等译. 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1992: 13.

选择时，不会出现逻辑推理谬误。再如，西方经济学中存在的“外部性”问题，即一个“经济人”的行为对另一个人的福利产生影响而这种或正或负的效果没有从货币或市场交易中反映出来，在“集体人”假设中，这类行为受到集体文化的影响，如道德观念或制度规范的鼓励或约束仍然会在交易或生产中表现出来，“外部性”问题可以转化为“内部性”因素。

其次，数字时代新人文经济学的理论内核是价值均衡化，而非利益最大化。传统的西方经济学核心是研究市场主体及国家或地区如何实现利益最大化，数字时代新人文经济学则将理论重心放在人和集体如何实现价值均衡化。价值均衡意味着个人效用最大化要考虑集体效用、企业利润最大化要考虑社会责任、国家福利最大化要考虑国际社会。没有兼顾这些考虑的经济发展是不可持续的，也不是数字时代新人文经济学的根本目标。价值均衡有助于限制市场经济活动中的物欲主义和功利主义，促进市场活动的规范有序。数字时代新人文经济学秉持人文价值的优先性、引领性和导向性，将人文价值转化为经济发展的内生动能，影响经济增长观念与人类发展理念，对西方经济学研究进行纠偏，回归经济增长的人本主义方向，将人的价值而非物的效率作为衡量经济发展水平的关键指标。

数字时代新人文经济学研究和追求的目标受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影响，较之西方经济学的目标也更为长远。利益最大化只是阶段性目标，动态均衡才是可持续发展的长期目标。物极必反，月盈则亏，不均衡可能有短期的兴盛，却很难有长期的繁荣。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推动价值不断趋于均衡的力量是兴衰。价值均衡与否决定着个人与集体的发展与衰落。个人行为追求个人价值与集体价值的均衡，谓之“人道”；国家行为追求国家价值与普遍价值的均衡，谓之“世道”；人类行为追求人类社会与自然生态的均衡，谓之“天道”。在兴盛与衰落的规律演化过程中，既可能是被动均衡，也可能是主动均衡。积极主动追求价值均衡才是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数字时代新人文经济学研究如何实现主动的价值均衡，这个过程中包含西方经济学研究的利益最大化阶段性目标，但着眼于事物演化的更长周期。

数字时代新人文经济学的价值均衡既包括财富利益的均衡，也涵括文化价值的均衡。文化价值的标准是合乎道义、趋于美善。个人行为不能完全以利益为出发点，要考虑正义与否。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国家行为不能完全以本国文化价值观进行判断和决策，要考虑能否为不同文化的国家或地区所接受。价值的内涵与文化息息相通。个人或国家只从自

身的价值观出发与他人或他国打交道, 缺乏理解与包容, 则冲突不可避免。数字时代新人文经济学追求的价值均衡旨在化解利益冲突。数字时代新人文经济学萌发和根植于历史悠久的中华文化。“中华文明五千多年发展史充分说明, 无论是物种、技术, 还是资源、人群, 甚至于思想、文化, 都是在不断传播、交流、互动中得以发展、得以进步的。”^① 文明交流与进步可以替代文明冲突和消亡。数字时代新人文经济学研究如何通过交流融合、价值均衡实现双赢多赢、共同发展。价值本身在人类发展过程中是历史性的, 其内涵始终在变与不变之间演化。传承、融合、创新、引领, 是价值演化的一般路径。

再次, 数字时代新人文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基于不同文化区域的特殊规律。在归纳总结一个具体国家或地区、具体发展阶段的特殊规律后, 才研究这种特殊规律是否适用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不同文化区域存在不同价值观念, 从而存在不同发展规律与历史路径。数字时代新人文经济学不是用西方经济学的视角和方法分析文化现象或经济规律, 而是通过独具特色和优势的理论视野与新范畴新表述来归纳和演绎不同文化影响下的发展规律与政策方向。

文化分特殊性文化与普遍性文化。“特殊性文化”是不同社会群体的独有特征, 未必在各个群体都会出现或普及, 例如中国人用筷子、说汉语, 美国人用刀叉、说英语。特殊性文化最初源自各个社会群体特殊的生存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不同的初始条件加上人们行为方式的路径依赖, 形成后来该群体较稳定的特殊性特征。特殊性文化不存在先进、落后之分, 但它是一个社会群体自我认同的内在力量。数字时代新人文经济学研究“特殊性文化”时, 秉持平等态度, 以文化交流超越文化隔阂, 以文化互鉴取代文化冲突, 以文化共存包容文化优越。“普遍性文化”是各个社会群体都会具有的特征。例如, 世界各民族都会使用工具, 而且工具发展大体都经过了石器时代、铜器时代、铁器时代等历史阶段, 只是早或晚而已。普遍性文化代表着一个社会群体的发展程度。从马车到汽车, 从弓箭到枪炮, 从采猎到农耕, 这些文化特征标志着文明的进步, 也是大部分民族都经历过的文化演进。普遍性文化存在先进、落后之分, 具有强传播性。先进文化对经济发展起正向促进作用, 落后文化起阻碍破坏作用。物质水平的提升促进精神道德水平。仓廩实而知礼节, 衣食足而知荣辱。传统的西方经济学主要研究物质利益, 新兴的人文经济学在研究经济发展的同时, 更重视精神文化。

^① 习近平. 把中国文明历史研究引向深入 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 [J]. 求是, 2022(14).

中国传统文化强调富民厚生、义利兼顾，以及精神文化对物质文化的作用。不同文化孕育不同的个体与集体关系，产生不同的协调方式以及不同的行为模式与政策出发点。文化不是真空存在，人类与自然互动的，不同空间里存在人与环境不同的演化规律与文化认知，塑造出不同的生态观念。因此，基于经济与文化、微观与宏观、文明与生态的关系，数字时代新人文经济学最为关注的不同文化区的规律与主题分别是：物质与精神的关系、个体与集体的关系、人类与环境的关系。

最后，数字时代新人文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兼顾人文主义方法与实证主义方法。实证主义的研究对象更多是具有确定性、普遍性和可量化性的客观自然现象，是自然科学最本质的方法论基础。与实证主义相反，人文主义不强调普遍性，而是强调个别性和主观性，其研究的现象很多是不可重复的，其成因有独特的背景和影响因素。由于人类社会的很多现象与行为不具有可重复性，人文主义方法往往只提供具体案例的特殊规律的解释，回答个人或集体行为的内在依据。社会现象中，通常人的思维、情感、意志与行动等具有非确定性、个别性和非量化性，无法被客观地加以解释和解析，这时人文主义的理解是社会科学的最本质的方法论基础。当然，有时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也符合科学研究条件：普遍存在的客观性可以通过一定的科学方法进行实证，且人类有能力开发或设计出相对应的科学方法。此时可以运用具有客观性和可重复的实证研究方法，对可信数据和材料进行量化分析，并通过公开的学术讨论建构关于此类社会现象解释与应用的一般理论。数字时代新人文经济学兼顾实证主义和人文主义两种方法，在量化研究的基础上使定性研究更加丰富、生动和可靠，提高研究内容的精确性，在科学化基础上凸显人文意义和价值内涵。

西方经济学更多或单纯重视实证方法，但精致的逻辑体系和数学模型构建起的公式化世界却忽视了经济学作为一门研究人的科学其本身应该具有的感性因素和人文属性，因此未能很好地解决“人”的问题。研究工具无法替代价值判断，理论模型不能视为普世真理。人文主义方法也有演绎推理，但更强调在不同文化背景下有针对性的规范方法，重点观察研究对象的特性与共性的统一。人文主义方法注重“整体式”研究，采用系统化思维，认为宇宙万象息息相通，不能离开环境孤立地分析人类的行为，不能用静止的思维看待人的选择，不能以“物”为中心强调理性从而导致人性的丧失，这都符合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数字时代新人文经济学是在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产物，

必然具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显著特征。马克思主义对异化的批判和“人”的全面发展学说也是一定视角上的人文主义方法论。马克思主张：“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①人文主义方法接续了中国传统思想中的人文精神。中国传统思想中有浓厚的人文主义思想，而儒家思想的人文色彩尤为典型。孔子所说的“君子不器”就是倡导人的定位不应该只如单一功能的器具，而应该是有更多内涵和素质的全面发展。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源不同，但彼此存在高度的契合性，因此共同塑造出人文主义方法的新学科理论应用。未来数字时代新人文经济学无论从内容的深度和广度方面，还是研究方法的多元与综合方面，都会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基础上不断拓宽，并朝跨学科与应用化的方向发展。

三、新超越：数字时代新人文经济学的视角与目标

一切划时代的理论，都是满足时代需要的产物。数字时代新人文经济学展现出人类社会新实践对理论创新性发展的思维方式突破与人文价值贡献，在研究视角、研究目标、研究领域等方面完成了对传统西方经济学的超越。

数字时代新人文经济学的研究视角是系统思维而非线性思维。人文价值与经济行为互为因果，有机统一，而非单向的决定与被决定关系，最终达到合理的均衡，且这种“合理”与“均衡”是动态变化的。这是系统思维的结果。系统是由若干要素组成的具有一定新功能且超出各要素功能相加的有机整体。在人文经济学的系统视角中，个体与集体都是更大系统的组成部分。每个行为主体的选择均会对系统产生影响并受到系统制约，因此主体进行选择时会自觉考虑相关影响与制约，从而经常会主动放弃最大化的方案，寻求某种均衡，表现出非线性思维，各子系统间的相互作用密不可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具有强烈的整体行为，行为主体目标由最大化转变为均衡化，更贴近现实。西方经济学的推导过程更多的是线性思维，虽然逻辑性强，但线性思维下，各子系统间显得缺乏关联，难以理解事物的真实运作，行为主体在最大化目标下往往不考虑其他要素的反馈机制。二者各有利弊：线性思维方式有助于深入思考，探究事物的关键因果；非线性思维方式有助于拓展思路，看到事物的普遍联系。从研究视角看，线性思维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M] //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3。

认为非线性一般都可以简化为线性来认识和处理，这种方法虽然有利于提高认识的效率，但常常为了追求简单性和便捷性而抛却事物的复杂性，会得到一种“假象式”的认识结果。真实的情况中很多因素都是难以预测的，要更贴近现实，经济学的研究思维就必须向非线性靠近。线性思维的哲学基础是假设现实世界本质上是线性的，非线性只是一种扰动因素；非线性思维的哲学基础则是假设现实世界本质上是非线性的，线性因素只是可以忽略不计的简单情形。线性系统的特征是存在因果开链，非线性系统的特征是存在因果闭链。线性思维按照线段式因果关系思考，非线性思维按照环状或网状因果关系思考。经济系统发展的本质是非线性相互作用，体现为要素间的排斥和吸引、竞争和协同。社会是一个有机体，系统不同层次之间，如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内部要素之间，发生非线性作用，推动系统演化。西方经济学运用线性思维模式在促进经济学发展与世界经济演化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积极作用，但也因线性思维的不足在实际运用中产生理论盲区和政策困境。数字时代新人文经济学的系统思维模式对传统的西方经济学研究进行纠偏，将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融合处理、经济行为与生态保护同步思考，用集体人假设取代经济人假设作为非线性思维的出发点，解决了西方经济学中的不少理论悖论。这是以系统观念构建经济学理论的新视野新思路，也是经济学理论发展的新范式新思维，更是人文主义视角超越资本主义逻辑的新觉悟新选择。

数字时代新人文经济学的研究目标是文明进步而非欲望满足。从根本上说，西方经济学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出发点是行为主体如何更好满足欲望，即个人的效用最大化、企业的利润最大化和国家的福利最大化，但追求欲望满足并不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全部内容和进步方向。人文经济学主张通过人的全面发展实现文明进步，不仅包括生产力的提升，也包括生产关系的改善，还包括天人关系的平衡，这是经济学的超越性意涵和颠覆性创新。文明进步的标准是综合的，可以从社会福利水平、道德价值理念、科学技术水平、生产关系性质、政治法律制度、生态环境质量等多种角度进行观察和评估。假如一个社会比以前富足，总体上在资源约束下基本实现了社会福利最大化，做到了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满足了西方经济学的追求目标，但却道德沦丧、精神空虚、缺乏公平正义善良、滥用武力、破坏生态，这种状态仍然偏离了数字时代新人文经济学所追求的文明进步。

文明进步的具体表现有三个方面的特征：个人素质、集体关系、生态观念。

文明进步首先体现为包括生理和心理的个人素质提升。身体素质充满活力、道德素质体现善良、工作生活幸福愉快是个人素质健康良好的标志。财富有利于健康，但财富最大化却不是健康之源。人性是复杂而立体的，个人健康可以通过多种方式获得，获得健康与幸福的方式途径是人文经济学的重要研究目标。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认为：“随着现代经济学与伦理学之间隔阂的不断加深，现代经济学已经出现了严重的贫困化现象。”^① 数字时代新人文经济学具有的新思维模式与新研究方向有助于克服西方经济学的某些局限和弊病，让研究目标回归人性与道德，促进人的素质提升与身心富足。

集体关系包括个体之间及集体之间的关系。数字时代新人文经济学认为，科技发达、财力丰厚却蛮不讲理、恃强凌弱的强盗行径不是文明进步，通过公平正义的观念与制度建立人与人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互相尊重的友善关系才是文明进步。集体关系协调不但要有财富创造能力和文明创新能力，还要有公平合理的分配制度，这是数字时代新人文经济学的重要研究目标。人文经济学研究如何发挥分配的功能和作用实现共同富裕，处理好效率和公平关系，构建起市场力量主导的初次分配、政府力量主导的再分配、道德力量主导的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在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创造和积累社会财富的同时，防止两极分化，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实现集体内部协调发展。同时研究如何通过对话协商、共建共享、合作共赢、交流互鉴，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的国际关系，通过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世界各国集体之间和平发展。

生态观念是人类社会不同时期不同文化区对待自然的不同态度。生态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固有的“天人合一”理念，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浑然一体，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数字时代新人文经济学研究人的全面发展，离不开人类生存的良好自然环境。生态和谐要求坚持系统观念，从生态系统整体性出发，提升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数字时代新人文经济学将西方经济学中的大量外部性问题转化为内部性因素，让制度约束和道德约束成为生态和谐的运行双轨。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辩证统一、相辅相成。建设生态文明、推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不仅可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而且可以推动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这种生产发

^① 阿马蒂亚·森. 伦理学与经济学 [M]. 王宇, 王文玉,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8: 13.

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才是文明进步的表现。

数字时代新人文经济学的研究领域从根本上讲，是人的行为，而不仅是资源配置。人不仅是劳动者，也是消费者，是社会演化与自然演化的主角。数字时代新人文经济学的研究领域，除了人力、物力、财力等物质资源和技术、艺术、观念等非物质资源的配置、消费与更新外，还有在人与自然的循环运动过程中，行为主体为适应生存和发展需要而产生的各种行为的特殊规律。具体包括个体行为、集体行为、人类行为三个层面，这些领域的研究内容离不开当前生产力、生产关系、生态环境三个方面的加速演化背景。

个体行为方式取决于特定生产力水平下的文化环境与个体观念。作为推动人类文明不断向前发展的根本性因素，生产力是具有劳动能力的人和生产资料相结合而形成的作用于劳动对象的能力。人是生产力构成要素中最革命、最能动、最活跃的要素，是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内在尺度。人类历史上，生产力每次出现重大飞跃都会重新定义“人”与“物”的关系，人的行为方式也会出现重大改变，会伴随新的生产水平出现新的行为方式。农业革命让人驯化了动植物，工业革命让机器取代了人力和畜力，当前的数字革命让人工智能部分取代和超越了人的智能。生产资料出现突破性变革，商业模式和人际关系随之出现根本性变化，人的观念与交往模式也必然出现适应性调整。同时，人不断从生产中解放出来，对全面发展的需求越来越高，从事职业与行为方式也日益复杂。在此背景下，数字时代新人文经济学运用人文主义方法研究不同个体的行为动机与实施结果，这是人类社会发展到新阶段对理论创新和研究内容的新要求。

生产力进步反映在个体行为与思维方式的变化上，要求经济学理论从更高层次更新情况研究个人行为模式。工业革命背景下的西方现代化片面追求物质财富，使人沦为资本增殖的工具。与此相对应的西方经济学根据当时主流的个体行为与思维方式特点，将理性精神片面定义为工具理性的计算思维，将价值观念窄化为功能主义与功利主义，将社会伦理抽象为个人主义与经济人假设。工具理性、功利主义、个人主义的片面发展构成了西方经济学中主体行为的基本模式。相较而言，数字革命背景下的中国式现代化追求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物质生产并非基于资本逻辑而是基于人的逻辑，精神满足并非基于个人逻辑而是基于集体逻辑。与此相对应的人文经济学观照中国式现代化中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研究个体行为与集体行为的关联互动。如今，基于信息技术兴起的第四次科技革命，以大数据、互联网、云计算、区块链及人工智能为代

表的新质生产力，正在深刻改变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塑造新的文明形态。新质生产力是生产力发展的高级形态，是生产力和科技进步的产物，是创新起主导作用的先进生产力质态。作为新质生产力构成要素的劳动者，如何具备最新生产力水平下的创新能力、集体意识与文化精神是人文经济学的重要研究内容。

集体行为方式取决于以生产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形态与意识形态的演化。生产关系和生产力辩证统一于生产方式。生产方式的发展促进文明形态和理论思想的更新，从而影响集体之间，特别是国际关系的指导思想。新质生产力的出现要求通过生产关系变革创造出更多创新型劳动者，而新型生产关系的出现不仅使劳动者从片面发展转向全面发展，还对处理集体之间关系提出共赢共生的理念。传统的生产要素如土地、资本等具有排他性，而数智化的生产工具和数据要素更多具有公共产品属性，较少或不具有排他性。新质生产力推动的资源共享和协同创新集中表现出一种社会融合效应，这要求在所有制形式上进一步实现数智化生产资料和数据要素的共享和融合。在西方现代化阶段，实行以社会化的机器大生产为物质条件、以生产资料的资本家私有制为主要特征的生产方式，每个人、每个国家都将其他人、其他国家视作实现自我目的的手段与工具。因此西方现代化产生了以原子化个体为基础的、孤独的大众社会，和以本国利益为优先的冲突式、碰撞式的国际关系。货币、资本与市场只是社会经济结构的中介，人与人之间、集体与集体之间缺乏友爱互助的集体精神和包容利他的交往方式，并导致了人与人之间的异化、陌生化、冷漠化，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安全感下降、冲突性增加，甚至爆发世界性战争。在中国式现代化阶段，保持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本特征的生产方式，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以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目标。资本活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依法进行，资本无序扩张受到遏制。货币、资本与市场缺陷得到有效约束，个人、集体与人类利益得到协调保障，平等、和谐、互助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正在逐步形成。数字时代新人文经济学需要研究新的生产关系下集体的行为模式与价值理念，个体与集体、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个人价值与共同价值的关系。

集体价值理念离不开文化土壤。数字时代新人文经济学诞生于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主义中国，其文化基础有两方面：一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二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这两者所蕴含的集体主义哲学思想是数字时代新人文经济学的文化基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九州共贯、多元一体的辩证思想，修齐治平、兴亡有责的家国情怀，还有贵和尚中、谦和好

礼、诚实守信、修己慎独、见利思义、精忠爱国等集体主义文化内涵。中华文明“主张以道德秩序构造一个群己合一的世界，在人己关系中以他人为重。倡导交通成和，反对隔绝闭塞；倡导共生并进，反对强人从己；倡导保合太和，反对丛林法则”^①。中华文明从来不用单一文化代替多元文化，而是由多元文化汇聚成共同文化。马克思同样主张要实现“自由人的联合体”，“只有在集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②。“既然正确理解的利益是整个道德的基础，那就必须使个别人的私人利益符合于全人类的利益。”^③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就是实现人的解放，建立“真正共同体”。这两种文化基础的特质与融合是数字时代新人文经济学的重要研究领域和内容。

人类行为方式取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理念、生产方式改变及生态环境变迁。工业化、全球化初期，随着生产力的巨大释放和生产关系的剧烈变动，人类在自然面前信心高涨，“征服自然”成为众多理论和学科的前进方向。信息化、智能化时代，人类更加认清破坏自然对自身的负面影响，“保护自然”日渐成为各种理论与学科的基本原则。在此背景下诞生的人文经济学具有天人合一、顺应自然、生态和谐的理念，与生产方式发展到一定阶段相关。随着生产力发展，人类劳动对象在广度和深度上发生了极大变化。从广度上看，科技创新延伸了劳动工具和劳动对象，人类利用和改造自然的范围扩展至深空、深海、深地等领域；从深度上看，劳动对象向网络化、智能化、数字化快速发展，信息、知识、数据等都转换成为新的劳动对象。人与从有形到无形的自然结合越紧密，人对自然的理解越深刻，人类行为越发尊重自然，追求融合发展。在生产关系方面，随着人类社会进入数字经济时代，万物互联使各类产业活动的边界逐渐变得模糊，区块链技术正在解体以往人类历史上以中心—层级控制为特征的组织关系，数字平台加速了人们网络活动的商品化过程、劳动技能的数字化过程、劳动方式的平台化过程、用户集体智慧的无酬劳动化过程，逐渐重塑以人民至上性、社会融合性、集体协作性和分配多元性为特征的人类新型和谐劳动关系。政府角色从曾经的控制中心和“守夜人”角色转变成为文明发展过程中的引导者与协调者。政府大力倡导和规范绿色健康生活方式，通过绿色科技不断完善绿色基础设施。通过

① 习近平. 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J]. 求是, 2023(17).

②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三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60: 84.

③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二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57: 167.

强化低碳零碳、资源循环、环境治理、生态修复、数字环境、智慧决策等领域前沿技术攻关，发展绿色生产力。通过鼓励绿色消费、绿色能源替代、绿色产品、绿色出行、绿色居住等，引导大众形成厉行节约的崇尚生态文明的社会风尚。

数字时代新人文经济学建立在中国传统文化生态伦理思想和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基础上。中国传统文化方面，继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天人合一与道法自然的价值理念，主张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和发展共同体。发展生态文明，应当顺应而不是违逆自然规律，合理开发和利用而不是肆意掠夺和破坏自然。马克思主义自然观方面，恩格斯说过：“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①马克思重视发挥人的本性和集体智慧与自然协调：“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②当代马克思主义也认为，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坚持把绿色低碳发展作为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治本之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厚植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③如何在经济发展中促进绿色转型，在绿色转型中探索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人类文明发展道路始终是数字时代新人文经济学的重要研究领域。

四、新特征：新人文经济学与传统人文经济学的差异

人文经济学作为经济学与人文社科交叉的研究领域，其思想渊源可追溯至19世纪。当时的经济学家和社会思想家就已经开始批判古典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劳动异化”，批判资本主义

① 恩格斯. 自然辩证法 [M] //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四卷. 2版.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383.

② 马克思. 资本论 第三卷 [M] //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二十五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4: 926-927.

③ 习近平. 以美丽中国建设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J]. 求是, 2024(1).

对人性的扭曲。^①20世纪初德国历史学派与制度学派的学者如李斯特（Friedrich List）、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则关注文化、制度对经济行为的塑造，强调历史比较和非经济因素的作用。^②1944年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在《大转型》中提出“经济嵌入社会”，反对市场至上主义。^③人文经济学的正式提出以1973年舒马赫的著作为标志。E.F.舒马赫（E. F. Schumacher）在1973年出版的《小的是美好的》中明确提出“人文经济学”概念，批判工业化对人和自然的剥削，倡导“以人为本”的经济模式。^④赫尔曼·戴利（Herman E. Daly）在1977年的《稳态经济学》中将生态伦理纳入经济分析，推动人文经济学与生态经济学的融合。^⑤20世纪80年代后，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的“能力方法”进一步系统化人文经济学的理论框架。此时人文经济学的研究方向逐渐明确，包括福祉经济学（如人类发展指数HDI）、社会经济学（社会资本、信任、公平对经济的影响）、文化经济学（文化遗产、创意产业的价值评估）以及伦理经济学（市场行为的道德边界，如尤努斯的“社会企业”）。^⑥2008年金融危机后，人文经济学作为超越新自由主义和计划经济的“第三种路径”受到更多关注，成为经济学研究的重要补充。

与人文经济学（humanistic economics）相类似的还有人本经济学（people-centered economics）。1990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发布首份《人类发展报告》，提出“人类发展指数”（HDI），明确以“人”而非GDP为核心衡量发展。这一理念被概括为“人本发展”（people-centered development），后延伸至经济学领域。世界银行、国际劳工组织等在2000年后广泛使用“people-centered growth”（人本增长）等术语。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等学者在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2000年）和“可持续发展目标”（2015年）的制定

① 马克思.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 //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42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9: 89-103.

② LIST F. Das Nationale System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M]. Stuttgart: J.G. Cotta, 1841. VEBLER T. The 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 An Economic Study of Institutions[M]. New York: Macmillan, 1899.

③ POLANYI K.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M]. New York: Farrar & Rinehart, 1944.

④ SCHUMACHER E F. Small Is Beautiful: A Study of Economics as if People Mattered[M]. London: Blond & Briggs, 1973.

⑤ DALY H E. Steady-State Economics[M]. San Francisco: W. H. Freeman, 1977.

⑥ SEN A. Development as Freedom[M].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99.

中，将“人本”理念系统融入经济政策框架。^①总的来看，人本经济学作为术语的广泛使用始于1990年UNDP报告，但作为完整政策框架成熟于21世纪初。人文经济学是经济学内部的反思运动；人本经济学是发展实践的政策工具化。人文经济学源于学术批判，需长期理论积淀；人本经济学更多是国际组织与政策界对发展问题的回应，实践需求推动概念快速成型。二者本质上都属于传统人文经济学，均诞生和成长于西方社会。

数字时代新人文经济学诞生和成长于中国社会，是新兴的数字经济时代萌生的以人民幸福为根本目标的经济哲学。与传统人文经济学相比，首先是理论根基的差异。西方传统人文经济学的思想源头是对资本主义异化的批判、对市场至上主义的反思，其核心诉求是在工业化社会中挽救人的主体性，强调个人自由与权利保障，理论典型特征仍是对抗性思维，将市场逻辑与人文价值对立。而中国新人文经济学的思想源泉是融合儒家“民本”思想、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理念、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发展观，其核心诉求是在市场经济发展中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追求效率与公平的动态平衡，理论典型特征是调和性思维，强调政府、市场、社会三元协同，有效市场+有为政府+有爱社会。其次是实践路径的差异。西方传统人文经济学的理念实施主体通常是NGO（非政府组织），而中国新人文经济学的实施主体是党政引领下的多元共治，政策工具与技术应用也更加多元与创新。再次是社会功能的差异。西方传统人文经济学是社会矛盾的缓冲器，主要解决资本扩张导致的社会撕裂，仍受制于资本逻辑。中国新人文经济学是现代化建设的推进器，其核心功能是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精神共富。最后数字时代中国新人文经济学突破了传统人文经济学：一是数字文明的东方智慧。例如区块链技术用于非遗传承人认证。二是规模治理的人文关怀。例如健康码系统同时保障防疫效率与特殊群体需求。三是发展伦理的新举措。例如将“绿水青山”纳入政绩考核。传统人文经济学本质是批判理论，中国新人文经济学实践则形成建构理论。西方重在揭示市场对人性的异化，中国探索市场经济条件下人文价值的制度化实现。这种差异恰如中医与西医之别：西方传统人文经济学像“病理学”，强调诊断市场经济的病症；中国新人文经济学像“养生学”，构建防病于未然的发展生态。例如当前中国正在形成的包含若干文化生态指标的“人文GDP”评价体系就可能为全球经济治理提供超越西方传统人文经济学的新范式。

^① SACHS J.D. The Age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5.

五、新框架：数字时代新人文经济学的创新逻辑

全书以“导论”为总纲，给出“新人文经济学”理论体系三个“基本设定”：其一，以“集体人”替代“经济人”，将文化与制度内生性；其二，以“价值均衡化”替代“利益最大化”，作为目标函数；其三，以系统思维矫正线性思维，强调因果闭链与整体协同。

第一篇“时代乐章”回答“现实何以可能”：沿“生产力—生产关系—生产技术—生态逻辑”的四级递进，描绘从工业革命到数字革命的结构迁移，提出由体力解放到脑力替代再到人机共生的演进脉络。生产力的跃迁催生了生产关系的重构，推动了生产技术的转型，并倒逼生态逻辑的根本转变。该篇提出了数字时代新人文经济学诞生的物质与技术前提，构成了全书分析的现实起点。

第二篇“文明演进”回答“价值何以安放”：围绕“人性解放—文明基因—价值坐标—治理哲学”，把上篇的“技术—结构变迁”上升为“价值—制度坐标”，明确义利均衡与德法共治的规范取向，为后续范式建构提供文明依据。该篇以人性解放为线索，追溯西方从文艺复兴个体解放到资本异化的历程，揭示其“二元对立”文明基因的局限，进而提出以中华“和合共生”智慧为基因的文明新路径，并在此基础上重构价值坐标与治理哲学。该篇揭示了西方经济学和新人文经济学产生的文明背景，并为摆脱西方经济学“物本”逻辑、构建以“人”为中心的新范式奠定逻辑基础，进行文明层面的正本清源。

第三篇“理论创新”回答“理论何以自治”：遵循“背景—核心—方法—范式意义”的四步法，先论证从资本逻辑走向人文逻辑的必然性，再把“价值均衡”正式表述为核心命题，并以系统思维整合实证与人文方法，形成可解释—可操作—可推广的理论装配。系统视角下，个体与集体置于同一更大系统中，目标由最大化转为均衡化。该篇是全书的核心理论支柱，它在前两篇的历史实践与文明反思基础上，系统提出新人文经济学的理论体系。首先明确理论背景是从“资本逻辑”走向“人文逻辑”；进而确立核心内容是从“利益最大”转向“价值均衡”；随之指出研究方法从线性分析走向系统思维；最终阐明其范式意义在于超越实力崇拜，指向人的全面发展与文明进步。这四章构成了新人文经济学“破—立—建—释”的完整理论建构过程。

第四篇“实践探索”回答“路径如何落地”：将新范式映射为四条实践治理路径——共同富裕、三元协同、价值内生、绿色转型，把“价值—制度—技术—

生态”联动成可执行的政策组合拳，推动“外部性”内生化和秩序协同。该篇从发展目标、市场边界、文化赋能、生态实践四个维度，具体展开新人文经济学在中国语境下的政策与实践路径，是理论的“落地”。

第五篇“维度超越”回答“如何持续进化”：通过目标升维（从功利到文明）、实践融合（领域贯通）、认知升维（从线性到曲面）、方法论涌现（从还原到涌现）构成闭环反馈，使全书形成“现实基础→价值坐标→范式构建→政策落地→维度升维”的螺旋式上升逻辑。研究主题最终回归个体—集体—自然的三角关系，以系统联动推动长期均衡。从思维层面实现更高维度的超越，最终指向一个物质与精神均衡、个体与集体和谐、人类与自然共生的文明新形态。

全书脉络总体上是“现实驱动—文明反思—理论建构—实践探索—思维超越”的五重递进。它以数字时代的生产力变革为起点，通过对中西文明基因的比较与反思，超越西方经济学的物化逻辑，构建以“人的全面发展”和“价值均衡”为核心的新范式，并在中国的实践中探索其现实路径，最终指向人类文明形态的全面升维。各章在“集体人—价值均衡—系统思维”的基本前提框架下，由历史与技术的“事实层”启航，经文明与制度的“价值层”定向，进入理论的“范式层”搭建，再到下沉政策的“行动层”落地，最终在“升维层”完成闭环优化，体现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整体学术工程。

理论是实践的总结和抽象。实践的发展必然要求理论的更新与创新。数字时代新人文经济学的勃兴是人类社会实践向前发展的时代要求。经济学研究需要由“物”向“人”、由“财富”向“精神”转变。工业革命和欧洲文明崛起的背景下诞生了西方经济学，数字革命和中华文明复兴的背景下催生了数字时代新人文经济学。数字时代新人文经济学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实践总结。深入研究数字时代新人文经济学，不仅让经济学变得更有人文温度，而且将为中国未来发展提供新理念、新范式和新路径。

数字时代新人文经济学以“集体人”假设为理论前提，认为个体行为只有同时符合个体与集体利益的选择才是理性的和正确的。“集体人”追求价值均衡化，而非利益最大化。价值本身在人类发展过程中是历史性的，其内涵始终在演化。在理论上，价值均衡对西方经济学进行纠偏，回归经济增长的人本主义方向，将人的价值而非物的效率作为衡量经济发展水平的关键指标。在实践中，价值均衡有助于限制市场经济活动中的物欲主义和功利主义，将人文价值转化为经济发展的内生动能，影响经济增长模式与人类发展理念。与西方经济学相比，数字时代

新人文经济学的研究以系统思维替代线性思维，以自觉平衡替代自发平衡。这是经济学理论发展的新范式新思维，是以人文主义视角超越资本主义逻辑的新觉悟新选择。

数字时代新人文经济学的研究目标是文明进步而非欲望满足。西方经济学的出发点是如何实现个人效用最大化、企业利润最大化和国家福利最大化。数字时代新人文经济学的出发点是如何通过人的全面发展实现文明进步，包括生产力提升、生产关系改善、天人关系平衡，这是经济学的超越性意涵和颠覆性创新。文明进步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个人素质、集体关系、生态和谐。对应的数字时代新人文经济学研究领域是个体行为、集体行为、人类行为。这些研究领域的内容离不开生产力、生产关系、生态环境的加速演化背景。数字革命时代，生产资料出现数字化、智能化等突破性变革，商业模式和人际关系出现根本性变化，人的观念与交往模式出现适应性调整。新型生产关系的出现不仅使劳动者从片面发展转向全面发展，还对处理集体之间的关系提出互赢共生的理念。生产方式改变及生态环境变迁，深刻影响着人类行为方式的改变。因此人类与环境的关系、个体与集体的关系、物质与精神的关系将是数字时代新人文经济学研究的重大主题。

世界是多元的，各国国情、文化传统、发展阶段各异。新人文经济学的成功实践，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单线思维，证明了不同文明背景的国家可以探索符合自身特色的发展道路。这种多元路径的存在本身就是人类文明的财富，需要融汇东西方智慧。“冲突基因”曾驱动征服与扩张，也带来了难以愈合的伤痕与迫在眉睫的生存危机。“共生基因”则昭示着一条超越对抗、走向和解、共建共享的新路。这条道路要求无论是西方文明还是东方文明，均能勇于批判反思自身的局限，以最大的诚意拥抱文明的多样性，在深度对话中实现智慧的互鉴与融合。在文明融合的背景下，新人文经济学对西方经济学不是代替，而是纠偏和拓展。

西方经济学，是西方文明理性光辉、个体觉醒、契约精神与工业革命浪潮共同孕育的璀璨明珠，其逻辑之精密、工具之强大，深刻塑造了现代世界经济图景。新人文经济学，则是中华文明天人合一、伦理本位、社群和谐、经世济民思想精华在数字革命新时代的创造性升华，其对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公平正义、人与自然和谐的执着追求，为解决当代发展困境提供了东方智慧。二者根系于不同的文明土壤，绽放出各具特色的思想之花。真正的文明智慧，不在于非此即彼的

傲慢独白，而在于海纳百川的互鉴共生。西方经济学的效率之维与新人文经济学的价值之锚，市场机制的活力之源与政府社会的协同之力，个体创新的璀璨之光与集体福祉的温暖之域，并非不可调和的矛盾，而是人类经济文明交响曲中不可或缺乐章。

自然科学追求客观规律，以真实为目标，依赖可重复实验方法，推崇理性至上。人文科学探索人生中的意义阐释，以美好为目标，依赖可表达体验方法，展现价值关怀。社会科学关注人类群体行为，以合理为目标，依赖可解释逻辑方法，推动效率福祉。“数字时代新人文经济学”是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的融合创新产物。它要求对经济问题从数字技术（自然科学）、伦理价值（人文科学）、社会影响（社会科学）多维度审视、判断与权衡。最终能够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设计出让人类既能追求效率（真），又能守护尊严（美）的协作框架。